

课程教材研究所
学术论著丛书



史编拾遗

苏寿桐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京)新登字 11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编拾遗/苏寿桐—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ISBN 7-107-11249-X

I. 史… II. 苏… III. 史学理论-中国-文集 IV. 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1472 号

史 编 拾 遗

苏寿桐 著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华云电子数据中心照排

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75 插页 2 字数 302,000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平装本 ISBN 7-107-11249-X/G·2790 定价 11.9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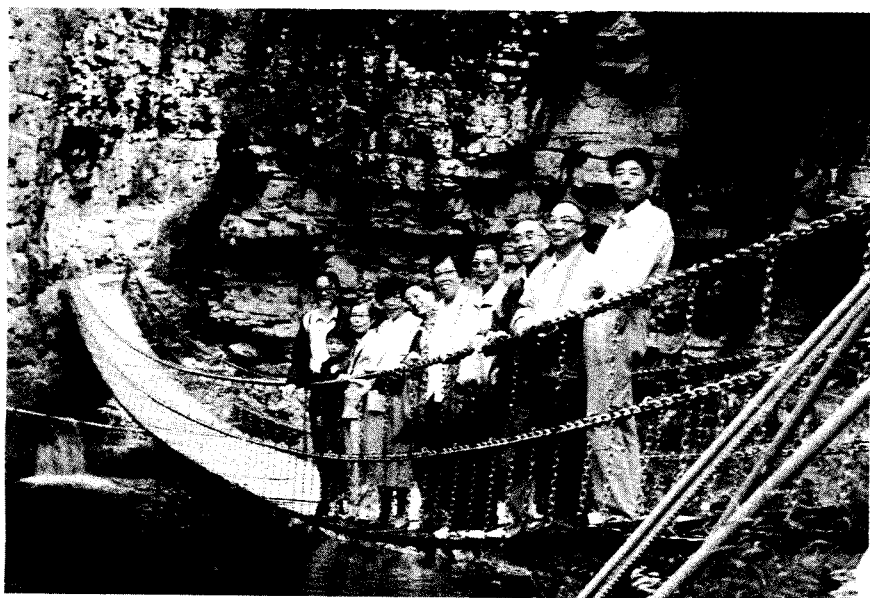
精装本 ISBN 7-107-11294-5/G·4453 定价 17.50 元



苏寿桐工作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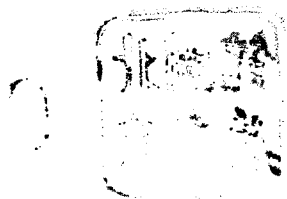
苏步青教授同苏寿桐和夫人杜梦鱼合影



苏寿桐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部分同志



苏寿桐和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合影



序 言

叶立群

我有幸在寿桐同志的文集《史编拾遗》付印前拜读全稿,其中有几篇是我以前读过,多数竟未读过,这次系统地读了一遍,获益良多。

各级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是通過教学活动达到的,教材,其中主要是教科书,是进行教学活动最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这种看法可能是大多数人都同意的,但是怎样才是有利于进行教学活动,有利于达到培养目标的教科书,怎样才能编写出这种教科书,恐怕相当多的人看法是不相同的,可能还有不少的人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甚至还有人认为只要读过书的人都可以编书,不就是那么一本讲些最浅显的知识的小册子吗?这是个不值得去考虑的问题。事实是,一本好的教科书是要经过认真的研究才能编写得出来的。多年从事教科书编辑工作的老教育家、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第一任社长叶圣陶对我们说过,编书不能放到篮子里的就是菜,编书要像蜜蜂酿蜜那样,采集、吸收大量的花

粉花蜜才能酿得出蜜来。读过《史编拾遗》，可以看出，寿桐同志为编写出适应我国需要，符合我国实际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40多年来，付出了多少艰辛的劳动。

《史编拾遗》虽然名为“拾遗”，但从新中国中小学历史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历史教材的改革和演变来看，留下了重要的可供今后借鉴的“足迹”。书中既有按时间先后论述了1954年的历史教材、1956年的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1961年的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未印出）、1978年的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1990年的义务教育初中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从中可以看到上述每一个时期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制订和编写的背景，改革的主要问题 and 指导思想，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结构和内容，又有对历史教育和教材中涉及的重要的原则性的问题，进行了专题分析和论述。例如1956年寿桐同志参与研究和确定处理办法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写中的几个原则性问题”，其中主要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问题、历史教材的基本线索问题、人民群众和个别历史人物的作用问题、历史教材中贯彻爱国主义和培养民族自尊心问题、关于世界历史教材的编写方针和中外历史的关系问题等。

再例如打倒“四人帮”以后，为了清除“四人帮”炮制的“影射史学”的内容和影响，1978年寿桐同志主持和组织历史组的同志研究并征求许多专家的意见，草拟了《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其中涉及的问题有：关于儒法斗争

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章节安排问题,关于农民战争同下一个封建王朝建立之初采取的经济措施的关系问题,关于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内部的斗争问题,关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下限问题。

寿桐同志是“在研究的基础上编书”的倡导人之一,也是这个观点和要求的模范的实践者。寿桐同志对上述原则性问题的极端重视和认真研究就是例子。另外,从本书选载的对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研究,对中国近代史中李秀成、洪大全等历史人物的研究,义和团的研究等论文,也都可以说明这一点。编教科书只要自己知道什么就写什么吗,只要因袭旧说,人云亦云吗?教科书中只讲信手抓来的浅显的知识吗?显然不是的,这是由于极少数人对教科书的作用和写法缺少认识的看法。编教科书有多方面的要求,我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要有利于贯彻教育方针和达到培养目标,这就要求编者必须有正确的科学的观点,编历史就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在众说纷纭的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去选材;二是要符合学生身心的发展状况和有利于促进他们健康成长。小学乃至初中讲的知识当然应该是浅显的,易于接受的,但是选择哪些知识和怎么表达和安排这些知识,这是要精心研究和设计的。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寿桐同志说过一句话:“教科书要深入浅出,浅中见深”。这是多年实践的体会,我是很赞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国家(如美、英、法、日等)

都把改革和办好中小学教育作为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措施之一。从这个要求出发,为了提高中小学的教学效果,分科教学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国内国外都有学者编著出版或建议出版分科教育学或者分科教材学,如“中学数学教育学”。分科教学研究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受到重视,几乎所有中小学都建立或建立过分科教学研究室,中国教育学会也成立了许多分科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并且有大量研究成果——论文或专著,有分科教学研究的需要和研究基础。我想把分科教育学和分科教材学作为一个教育学或教学论的分支,使得研究的目的更明确,课题更集中,是有利于我国教育改革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的。

40多年来寿桐同志先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的领导者之一,同巩绍英、陈乐素、邱汉生等同志筹划、研究、制订和编写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几套教学大纲和教科书。打倒“四人帮”以后,他担任中央教育部组织的“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历史教材编写组负责人,尔后又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和课程教材研究所学术委员,主管历史编辑室的工作,他组织历史组(室)的同志拨乱反正,研究制订和编写出版了1978年的历史教学大纲和通用教科书。1986年9月至今,他受聘为全国中小学审定委员会历史教材审查委员会委员,以后又继续受聘为审定委员和审查委员。大致也是在这一时期,寿桐同志先是被选为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任期满后,又连接两届被选

为理事长。1990年寿桐同志离休,但仍被聘为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咨询委员和历史教材顾问,主要担任义务教育初中阶段历史教材和后续的高中历史教材的审订工作。40多年来寿桐同志不仅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历史教材的研究和编写工作,而且参加了历次教学计划制订时历史课程设置的研究和讨论,主持或参与主持历次教学大纲的制订工作,参与评价、审查历史教材工作,对历史教育和历史教材中从历史教育功能到教学方法等问题进行研究和组织研究工作。这本《史编拾遗》也可以说是他工作和研究的主要成果吧。

40多年来,寿桐同志一直同我在一块儿工作,“疑义相与析”,使我们彼此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寿桐同志希望我为这本书写篇序。虽然我知道写不好,但义不容辞,就把我对《史编拾遗》的读后感写出来,假如对读者了解本书和本书作者有些帮助,那我就十分高兴和感谢了。

序 言

王宏志

苏寿桐先生的《史编拾遗》即将付梓,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这一书名包含着作者的自谦,即把本书丰厚的40篇文著,不过视为零星的“拾遗”而已。然而,从作者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献身于历史教材的编著工作来说却又是切题的。寿桐先生把全部学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中小学历史教材的编著工作中,而不能用更多的时间撰写更多的属于自己的学术著作。我们常说编辑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而教材编著工作,却不是一般的为他人做嫁衣裳,而是从策划、设计编写方案,到一个一个字的爬格子编写、审稿、定稿全部要自己完成。而且,这一系列的工作关系到培养下一代人,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教育质量,总之,是关系到整个民族文化素质提高的一项重大工程。寿桐先生就是这项工程的出色奉献者。

《史编拾遗》共收入40篇文章,内容十分广泛,博古通今,上迄三皇五帝,下至今天的共和国史,均涉及其中。

就其学术研究而言,偏重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几篇近代史论著中,如关于李秀成的评价问题,洪大全的研究,以及有关义和团的论著,都表现出作者严谨、求是的治学态度,以及扎实、一丝不苟的学风。这些文章的深度和学术价值为许多读者仰目。然而,这组文章并不是本书的主体,本书的价值更主要的是在教科书的探讨和研究上。其中史编、史论、史评和其他这四个部分,都是教材建设方面的论著。从课程设置、历史教学大纲的编写、历史教材的编写原则、编写内容、编写中应注意的问题,到历史教育功能等等,凡是历史教材编写中可能涉及到的重点问题,这书基本上都涉及到了。因此,我们不但能从书中了解到新中国建立以来历史教科书发展的历程,更能学到编写教科书的宝贵经验。

作为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第一代中小学历史教材的编撰者和这项工作的领导者,寿桐先生是一位有突出贡献的、有造诣的专家和学者。几十年来,他对历史教材的建设,溶进了全部心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课程设置上,他主张历史课的课时不能太少,因为现在中学生的历史知识都比较贫乏,要使学生掌握应有的历史知识,就要有课时的保证。寿桐先生非常重视历史教材编写中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主张历史教材的编写者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研究历史史实。他强调历史的教育功能,指出历史教学对学生“进行社会发展教育的任务”,同时更是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和培养学生爱国主义与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手段。他

主张历史教科书要通过叙述生动的史实,向学生进行教育,使他们从中受到启发,臧否褒贬,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他要求从事历史教材编写的人,不仅要学好马克思主义,还必须有广博的历史知识作基础,并对涉及的历史人物、事件都要进行认真的研究,不但要有自己深刻的见解,还要了解学术界的研究动态,随时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编入教科书的内容必须是准确的、客观的、有教育意义的。这样才能编写出合格的教材。今天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这支编写队伍,就是按照他和历史室的其他前辈的这种思想培育出来的。实践证明,寿桐先生的许多设想和经验,对当时、现在和将来的历史教材的编写都有重要指导作用和参考价值。

我在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分配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寿桐先生当时是我的直接领导,在教材编写工作中,我是他的学生。从他身上我看到他对编写历史教科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尤其是对晚辈的热情帮助和严格要求。这些都使我很快地热爱起编写历史教材的工作,并在他和陈乐素、邱汉生等前辈的悉心培育下,较快地走上了编写教材的轨道,并逐步成长。可以说,今天我能成为一个比较熟练的历史教材编写者,是同寿桐先生等老一辈专家、学者的指导、帮助分不开的。当《史编拾遗》出版之际,我出自内心的高兴和欢悦,寿桐先生要我写几个字放在书中,我感到荣幸,欣然答应,借此表达我对寿桐先生的敬意。我热切希望《史编拾遗》早日出版。

《史编拾遗》自序

苏寿桐

《史编拾遗》中的40篇文章(包括讲话、书评和纪念文章),是我近30年(“文革”10年除外)来利用工作之余,挤时间撰写而成的。某些文章的写作,是由于当时形势的驱使,如我和吴雁南合作的《略论李秀成》一文,就是这样的情况。60年代初,在社会科学界“左”的思潮已有所抬头,反映在史学研究领域中影射史学也逐渐泛滥,如何评价太平天国后期杰出将领李秀成被俘后的表现,就是当时的热门话题之一。有人鼓吹“忠王不忠”,名为评价历史人物,实则影射现实,为所谓“揪叛徒”制造种种谬论。我在这本书中,有关这个问题,先后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在“文革”前的1964年,一篇在“文革”后的1979年,用意无非是为了表明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一贯看法。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北方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它的正义性无疑应大书特书。我从50年代开始从事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同时,就注意留心

这方面资料的积累,对这个问题已有所思考。我以为,义和团运动除了肯定它的正义性外,后期由于清政府的介入,进入北京以后,下层团员虽仍然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但上层却混进了一些亲王权贵,某些人甚至以“团首”自居,成份趋于复杂,队伍已有所变化;反抗手段一直专注于盲目排外。所以“以史为鉴”,对它的评价前后应有所区别,不能笼统地全盘肯定,更不能横加指责。为此,我写了一篇《试论庚子北京义和团运动》,从历史的角度,为善良的人民提供经验教训。

对我国历史教育和历史教材,过去有人已有所注意,并出版过一些论著。近年来,我开始这方面问题的探索,写了《中国古代历史教育初探》、《我国封建时代历史教育和教材》两篇文章;对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历史教科书的草创和演变,我写了《中学历史教科书三十年》、《我国历史教学和历史教材的沿革》、《1954、1956、1978年中学中国历史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简介》、《介绍新编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历史教学大纲》、《1978年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修订说明》、《谈谈对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的几点体会》等多篇文章,系统地介绍新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发展历程。

总结编写历史教科书的经验,探索历史教育的特点,为未来留下前人的足迹,这是长期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编辑人员应当承担的责任。为此,我写了《编好历史教科书的几个原则问题》、《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应当注意的问题》等文章。同时由于我从80年代初以来,担

任三届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理事长,在学会同仁的支持下,先后编辑、出版了四本论文集,我为其中的三本写了序言,介绍打倒“四人帮”后,中国历史教育研究的情况,中外历史教学学术交流动态,大陆和台湾、香港地区学人的交往等。

历史是实证科学,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当前尤其要按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动历史教育和历史教材的发展。在这本书中,我谈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国情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继承、发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等问题,目的是围绕时代的主旋律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贡献力量。

对于香港和台湾的中学历史课本,我和几位同志较早地已经注意这个问题。1979年冬,我和陈光中、臧懋、王剑英同志(王剑英的历史地图部分文章刊出时被删去)合写过一篇题为《香港台湾中学中国历史课本评介》的文章,发表在《中国史研究动态》。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我们从材料和观点上是力求实事求是地进行探索。这次我把它作为历史的记录,收集到这本书中,以供这方面的同好参考。

50年代以来,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是一个学风纯正、团结合作的集体。我在这个集体中,追随群贤之后,受益非浅。这本书的出版,首先应当归功于这个集体的合作和鼓励。我的已故妻子杜梦鱼几十年来对我也给予多方支持,使我得以潜心从事编辑和专业